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学术著作

抗战时期 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

主 编 ● 潘 洵

副主编 ● 鲁克亮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学术著作

抗战时期 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

主 编：潘 洵
副 主 编：鲁克亮
编 写：潘 洵 鲁克亮 袁 韵
肖向龙 李桂芳 胡阳旭
王 颖 李再强 唐伯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 / 潘洵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29-03786-4

I. 抗... II. 潘... III. 社会变迁—研究—西南地区—1937~1945 IV. K265.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8562 号

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

KANGZHAN SHIJI XI'NAN HOUFANG SHEHUI BIANQIAN YANJIU

潘 洵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林 林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陈 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40mm × 1 030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07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786-4

定价: 40.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 主 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铨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傅 高 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 贤 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 本 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 笙 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 心 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 宏 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 1937 年冬到 1946 年夏前后将近 9 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 5 年，在铜梁 201 师 603 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 年暮春，我在 57 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民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

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总 序	1
绪 论	1
一、研究视域的界定	1
二、研究的前提和缘起	9
第一章 战时西南人口移动及其影响	13
一、人口移动的过程及流向	13
二、人口移动的主要特征	21
三、人口移动的缘由	28
四、人口移动的影响	35
第二章 战时后方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	45
一、社会阶层的变化	46
二、社会流动的变化	57
第三章 战时西南社会经济的变迁	63
一、社会经济变迁的历程及原因	63
二、社会经济变迁的特点	74
三、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	81

第四章 战时西南社会生活的变迁	85
一、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	85
二、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	91
三、难民的生活状况	99
第五章 战时后方劳工问题及其治理	102
一、战时劳工问题的成因	103
二、后方劳工问题的表现	106
三、后方劳工问题的特点及影响	119
四、后方劳工问题的治理	122
第六章 战时后方的难童救济与教养	127
一、战时的难童问题	127
二、后方的难童救济	129
三、后方的难童教养	137
四、后方难童教养的特点及影响	154
第七章 战时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及其影响	158
一、后方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	158
二、后方科技社团的主要活动	160
三、后方科技社团发展的特点及影响	163
第八章 战时后方的医疗救护	168
一、后方医疗救护的困境	168
二、后方医疗救护的政策与体系	173
三、后方医疗救护的措施及成效	183
第九章 战时重庆抗属优待政策与实施	194
一、战时重庆抗属概况及优待政策的制定	194

二、战时重庆抗属优待政策的实施	201
三、战时重庆抗属优待工作的特点与成效	220
第十章 战时重庆的劳军募捐运动	228
一、战时重庆劳军募捐运动兴起的背景	228
二、战时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的演进	231
三、战时重庆劳军募捐的组织、形式及特点	245
四、战时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的地位与作用	258
第十一章 重庆大轰炸与重庆城市社会变迁	265
一、对重庆城市发展的影响	265
二、对重庆城市人口变动的影响	275
三、对重庆市民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	281
四、对重庆民众意识变化的影响	285
附录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	294
一、人口流动	294
二、社会意识变动	297
三、阶级阶层的变动	299
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301
五、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变化	302
六、农民生活的变化	304
后 记	307

绪 论

西南就地域上讲,无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支持和支援前方抗战的最为重要的后方战略地区之一。虽然国内涉及抗战大后方史的研究论著颇多,但明确的以抗战西南大后方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却寥寥无几。在此情况下,关于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的研究也不多见,既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和人口变迁方面,这些研究,虽然在内容上都是关于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都不是社会史的研究,而是属于人口史或经济史的范畴。尽管如此,现有的海内外学者丰硕而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还是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较高的起点。本书中所选取的课题,如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社会生活的变迁、劳工问题及其治理、西南后方的难童教养、后方的医疗救护、战时重庆抗属优待政策与实施、战时重庆的劳军募捐运动、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及其影响、重庆大轰炸与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等,都是以往研究中涉及较少或尚处空白的领域。

一、研究视域的界定

历史上,“西南”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动态概念,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西南”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在有关论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者心目中大小不一的“西南”,孰是孰非,似难简单断言。但在本书正式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概念进行界定。

(一) 西南区域的界定

“西南”一词首先代表的是某种相对的方向和方位,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名词。不管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历史实际中,“西南”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当中原汉文化定都长安时,“西南”指的是秦岭以南、巫山以西的大片区域。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定都成都,“西南”缩小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一小块地区。而到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以后,连唐朝时期的中国首都长安也变为“西安”,此时的“西南”地域又变得异常的广阔了。

在历史上,西南还是与中原文化相对应的一种他称,暗示着一种对其知之甚少的异类文化。从汉至清,西南一概被视为“蛮夷”之区,或者正史不载,或者极其简略,语焉不详。司马迁著《史记》,首次标列“西南”之名,辟为专传,即《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各民族情况,当时的“西南”,大致包括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部。自此以后,虽然“西南”一词的地域含义变化不定,但历代关于“西南”的记载大致不出如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广西、西藏、湖北、湖南地区。近代以来,西南的地域划分存在“大西南”和“小西南”两种方法,且有“西南七省”(川、康、滇、黔、桂、湘、粤)、“西南六省”(川、康、滇、黔、桂、湘)、“西南五省”(川、康、滇、黔、桂)、“西南四省”(川、康、滇、黔)等诸种说法。

民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当时与北洋军阀相抗衡的西南军阀,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人们对“西南”地域的认识仍然未有定论,“地质学家谢家荣先生以经济为观点,分全国煤矿为六大区,其中一区为西南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之煤田;黄汲清先生则以地理为观点,分西南为‘大西南’与‘小西南’两种,小西南包括川滇黔康四省和西藏的东部,而以湖北、广东、广西以及陕西之汉中区为小西南之前卫,合并称为‘大西南’;经济学者史维焕、蒋滋福两先生则谓西南应包括川康滇黔桂湘六省”^①。据中国旅行社1939年10月初版画册《西南揽胜》序言所记,“以言开发西南之区域,实以四川、贵州、云南、湖

^① 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页。

南、广西五省为其范畴”^①。这大致反映了抗战初期一般国人对西南地域的认识。而著名学者蒋君章在抗战时期所著《西南经济地理》一书中,“参酌各家所说,及国防经济上彼此相依的特点,定川黔桂滇康五省为西南”^②。蒋君章对西南区域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以上种种对“西南”的界定中,没有沦陷或成为战区,而具有支持和支援持久抗战功能的战略后方基地,大致包括在蒋君章所言西南五省范围之中。由于重庆在1939年确定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又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因此,本书所指的“西南”,即指处在抗战大后方,相对较为稳定的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西康省五省一市区域。

西南是一个地域辽阔、地势高峻、山峦起伏、地形复杂多样的地区。据胡焕庸先生估计,战前西南地区的土地面积为1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3.9%,人口为8600余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就各省而言,四川面积占全国第9位,人口占全国第1位;云南面积占全国第7位,人口占全国第14位;广西面积占全国第17位,人口占全国第13位;贵州面积占全国第20位,人口占第17位;西康面积占全国第16位,人口占全国第23位^③。其中四川人口最多,约占全区的60%。西南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汉族外,有藏、彝、苗、壮、布依、白、哈尼、傣、侗、回等30多个少数民族,战前人口已达1000多万。

由于西南地区气候多样,地形地质复杂,非常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单就四川而言,玉米、甘薯、油菜、烟草产量居全国第一,稻谷居全国第二,大麦、生丝居全国第四,小麦居全国第七^④,并出产桐油、茶叶、药材、白蜡等大量农副产品。西南地区还拥有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力资源。煤、铁、盐等常用矿产储量在全国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单项储量较多,如四川煤的储量,仅次于山西、陕西而位居全国第三位。而各种稀有金属的储量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云南东川、西康会理、四川彭县的铜矿,云南个旧、广西贺县等地的锡矿,西康会理的金矿、镍矿等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此外,西南地区是世

① 施康强:《浪迹滇黔桂》编者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② 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页。

③ 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3页。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印:《中国战时经济建设问题》(内部刊行),1940年3月,第32页。

界上水力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二) 战前西南区域的社会变迁

从社会学理论上讲,社会变迁的含义极其广泛,它泛指社会运行过程中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社会变化的过程,也包括社会变化的结果。从类型上说,社会变迁有整体变迁,也有局部变迁;有进步的变迁,也有倒退的变迁;有急剧的变迁,也有缓慢的变迁。因此,社会变迁实际上是指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

从秦朝开始,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南进行了开发和治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变迁。秦汉时期,中原政府利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逐步统一了西南民族地区,并开始设置郡县、兴修水利(如秦灭蜀后修建都江堰)、修筑道路,对西南地区进行经营和开发,推动了西南特别是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国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国家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而西南地区相对较为安定,特别是在蜀汉、成汉政权时期,由于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主张的成功实践,西南地区民族关系较为融洽,加之实行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实施屯田,推动了这里的社会生产力的变革。隋唐时期,四川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益州(蜀)成为西部地区最繁荣的地区(史称“扬一益二”),而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行诸葛亮所创立的“羁縻制度”,西南各族人民得到较充分的自立发展,不少民族相继实现了文化跃进,诞生了一批古代民族^①。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完善和“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大规模的屯田和移民开发,水陆交通的拓展,以及积极的农业和手工业举措,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西南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取得了重大进展。

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地区(主要是巴蜀地区)的社会发展,但由于西南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民族众多且关系复杂,文化另类,加之中央政府长期视其为“蛮夷”之地,直到近代西南一些重要城市开埠之前,大部分地区仍是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落后。除个别地区个别行业出现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外,西南地区总体

^① 杨庭硕、罗康隆:《西南和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上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在云南、贵州的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领主经济、奴隶制经济和氏族部落原始经济,甚至显现出一种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原始状态。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南地区成为英法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后门,蒙自、重庆、思茅、昆明等先后被迫或自主开为商埠,中国政府也被迫同意在云南修筑铁路。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清末“新政”的实施和中华民国成立后对振兴实业的提倡,西南地区的近代工业、农业、金融、交通等逐步兴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遭到破坏,城乡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西南社会逐步步入了近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后,西南地区出现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军阀统治。频繁的军阀混战,繁重的苛捐杂税,骇人听闻的田赋预征,以及鸦片种植和吸食的泛滥,不仅严重阻碍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导致了西南区域社会的长期动荡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极端恶化。

抗战前夕,西南农村经济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粗放经营的落后状态,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生产发展程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大农民终日劳作,尚不得温饱,稍遇风雨不顺,即会减产歉收,造成饥荒。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也极其低下,据1937年9月实业部统计,全国符合工厂登记条件的工厂3935家,资本3.7亿多元,工人45万余人,而西南地区仅有工厂163家、资本740多万元、工人不足2万人,分别占总数的4%、2%和4%^①,西南工业的落后状况,由此可见一斑。经济的落后,大大阻碍了文教事业的进步。据1936年统计,全国有专科以上的高等学校108所,而在西南地区仅有四川4所,云南、广西各1所,仅占全国总数的5.5%。农业萎缩、工业衰退,加之兵匪横行、横征暴敛、社会失控、民不聊生。以四川为例,农村中有1/3的人口只能靠借贷维持生活,而城市失业人口则高达500余万,“老弱转死沟壑,壮者逃之四方”,导致人口急剧下降,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四川人口减少2400多万^②。

① 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印《工业统计资料提要》,1945年7月。

② 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6页。